

# “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意义

□辛向阳

## 本期特稿

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此,张德江委员长在3月5日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面临一系列新形势。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迈过去的难题。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其次,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局,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长期向好,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为了应对种种复杂局面,中央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党的八大就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这一宏伟目标的内容内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各民族共同的事业,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这样的战略目标激动人心,让人奋起。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所谓决定性阶段就是成败在此一举的阶段。要想在这一阶段取得成功,就要解决这一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关键的就在于深化改革。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同样也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招。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我们进行的改革不是单一领域、孤立环节的改革,而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越深入,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就越突出,作用就越重大。全面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更是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能否真正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的新高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顶层设计,谈到全面深化改革,他提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谈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他要求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谈到住房改革与发展,他提出要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谈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合作时,他提出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方向和目标,构建“1+2+3”合作格局,等等。如何实现这诸多顶层设计的统一?最根本的就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去进行设计和谋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进行各方面工作顶层设计的基础要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党执政兴国的新局面。所谓新局面就是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敢于涉险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向一切艰难险阻发起冲击。首先,党执政兴国就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破解各种难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比如在政府审批权力的改革上就是“大刀阔斧”: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其次,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执法司法问题。大力解决立法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认真解决比较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系统解决仍然存在的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科学解决较为突出的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等。第三,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彻底根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坚决消除影响党的战斗力的沉疴。在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坚定而且自信的表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型国家、学习型社会、“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两型”社会等,这都要求党治国理政要有新的方式。什么方式?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也

同样包含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全面从严治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引导和架构作用。

##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的、系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证明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完备性的特点。1913年3月,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全面的、系统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要求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联系,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理论在当代中国最实际最系统最好的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用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全面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政策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就能够更加自觉地树立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心中有数,又能做到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推动事业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全面性的特点,具有“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全面战略思维。1975年邓小平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1989年11月,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要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比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一些同志在认识上和工作上,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摆来摆去,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从宏观层面来讲,无论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的五个统筹,还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八个统筹,其核心都是全面的、系统的观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全面就是要防止片面性,就是要有系统、整体、协同的观点,全面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要有重点,要善于以点带面。习近平总书记等多个方面都阐述了全面的辩证观点: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在改革中,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关于社会治理,“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这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是体现“两点论”的全面观,是体现辩证法的全面观,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品格的全面观。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 准确把握主动适应新常态

## 观点聚焦

新常态首先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深入论述新常态。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阐释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已然是在进行时,如何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 新常态是新认识新概括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指出,经济新常态并不是一个随意提出的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战略内涵。它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均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常态的内容不能泛化,不能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失去解决矛盾、问题的时机和动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现象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导致长期经济政策发生偏离;更不能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不能把经济下行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需求不足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和理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基调,关系我国经济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势。因此,形成对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十分必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产能和产业结构调整等9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全面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九大特征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中体现了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决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持续健康发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不可把新常态庸俗化

邱炜煌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一些地方和同志歪曲新常态,把新常态庸俗化,曲解中央对新常态的要求,应该引起重视。

把新常态庸俗化,不但体现在对中央决策的认知模糊、态度漠然,而且还反映了一些人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精神状态,更为严重的是消解人们的斗志,削弱中央的权威。把新常态庸俗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标签化。有的同志为了体现自己“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什么工作都冠之以“新常态”。不能把某个偶然、短暂、单一的新变化、新问题、新矛盾视为新常态。二是娱乐化。有的同志把社会生活中各种新奇、奇特都纳入新常态,甚至成为插科打诨的元素、搞笑逗乐的佐料,连公务员正常的工作时间不上网不炒股不淘宝也被美其名曰新常态。三是贬损化。有的同志把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称为新常态,为等待观望找理由,为无所作为推责任;有的把一些尚不规范或有待明确的事物简单判断为新常态,如一些单位取消干部职工的正常福利作为政治生活新常态,诱发人们对反“四风”的不满情绪和对新常态的逆反心理。

新常态的本质要求是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攻坚克难、积极作为。它不该成为畏难的托词和失败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为官不为”的挡箭牌。

### 新常态应当创新思维

# 着眼“在身边” 服务“面对面” 积极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

庄跃勇

## 实践与思考

在社区开展红十字服务工作,既是转变服务方式、激发组织活力的有效载体,又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点方向。要把职能下沉到社区,把权力下放到社区,把服务下移到社区,搭建起社区“在身边”这个平台,让居民享受“面对面”服务,使社区红十字服务功能更齐全,作用更明显,实施更有效。

### 一、搭建志愿服务平台,让“爱”时刻在身边

志愿服务是社区红十字服务的重要工作,只有把居民身边的这个平台搭建起来,才能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享受人道关爱、感受身边服务。

一要建立志愿队伍。把社区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建设作为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推进的重要抓手,结合居家养老服务、构建和谐社区,建立组织涵盖家电维修、抢险救灾、送医

的需求和企盼,只有在社区居民的身边搭建起应急救援的服务平台,让大家做到知救护、会救护、能救护,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才能减轻突发意外造成的身体伤害,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二要建立社区“红十字应急救援学校”。借助社区道德讲堂、党员活动中心等场所建立“红十字救护培训学校”,配备电脑、投影仪、模拟人、三角巾等救护培训设施,采用集中授课与课余操作的方式,开展救护员培训与急救知识普及及培训。二要建立社区应急救援点。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急救救护点,让急救时刻在身边。同时,根据各站点的不同需求,配备担架、轮椅、诊疗床、急救箱等急救物品,力争使社区达到10分钟急救圈。三要设立社区楼道救护员AB岗。在有条件的社区楼道设立救护员AB岗,加大社区工作人员和各楼层退休人员急救知识的培训力度,为每个楼道培养2名以上救护员,保障楼道居民在遇到意外时能及时得到救护。

### 二、搭建急救平台,让“救”时刻在身边

社区居民把健康安全视为最大心愿,最重要的事情,反映了居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的任务、环境、条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既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很难解决新问题,因而应当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必须围绕新常态的重点任务,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每天作出的选择和决策,其中都有下意识、不自觉的习惯使然成分。长期发展实践形成的思维惯性,使我们即使面对新常态下的新问题,依然很难抛开原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例如,只要经济增速放缓,就习惯于实施刺激政策,结果保护了落后产能,延误了创新。又如,一些地方对新常态的发展思路依然是铺摊子、上项目。一些人嘴上说是新常态,但思维方式、行事方式还是老一套。其中最根深蒂固的,还是过分相信和依赖行政力量。这种习惯影响之深,有时会使人认识不到它是一种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旧习惯。

### 以新常态超越“新平庸”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撰文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2013—2023年的5%,然后进一步下降到2023—2033年的3%略强。其预测依据是所谓的“趋中律”,即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种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大体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这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是,这类预测既没有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明显低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虽然正在经历下降过程,但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将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年度潜在增长率,1995—2010年为10.3%，“十二五”时期为7.6%，“十三五”时期估计为6.2%。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再次为中国赢得接近2个百分点的额外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7%左右这样一个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近年来仅略高于3%,是各国经济不同增长速度的平均值,而不是各国经济增速一概略高于3%。我国经济增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下哪个位置,绝不是由什么统计“规律”先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政策应对。全面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理解我国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并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对“新平庸”的超越。

### 地方发展要跟上新常态节奏

周人杰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总的来看,与全国GDP从高速向中高速的回落相匹配,各地指标或多或少在调控,中国GDP总量已经今非昔比,6.36万亿元的体量,哪怕只有7%—8%的增速,实际增幅都不低了,所带动的企业效益、就业人口都是天文数字。放到各个省来看,也同样如此。因此,着实没必要过分纠结快慢,在一定速度基础上,侧重关注结构与质量、幸福与平安,才是理性之选。

然而,步入新常态,不等于不要增长了;清醒对待GDP,不等于不要GDP了。各地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比如,上海可以不再关注GDP指标,而有些中西部地区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点。其实,从中央到地方,降下来的GDP增速,本质上属于一种预期性约束。7%也好,8%也罢,只是底线要求,只为减少“锦标赛”的负面压力。如同真正的优等生从不是家长们逼出来的,好马会“无须扬鞭自奋蹄”,好的增长潜力也不是硬压出来的,把担子放下,集中精力改善发展环境,简政放权,为企业自主壮大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效果将更好,反过来还会“逆袭”,带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

数字减负的背后,是政绩观的矫正。以往,为了追求漂亮的工作报告,一些地方热衷于互相攀比、贪吃卯粮,土地财政、融资平台搞得不亦乐乎,结果严重伤害长期发展的内力。欲取之,必先予之,把GDP这根紧绷的弦松下来,目的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是为“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当省、市、县各级治理者的目光,从单一的增长率转向综合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必将绽放新的生机与活力,不啻一场“二次革命”。(李 伦)

## 理论漫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明代的宋濂在《高台药石·卷上》中提到了廉政的三重境界,从高到低分别是:见理明而不妄取,尚名节而不苟取,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

# 常存患“失”之心

董寒斌

因此,防贪不仅要做到形式上的不取、不得,更要做到实质上的不取。前者靠的是严明的法纪与权力的公开等外部制度的制约,后者则有赖于从政为官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从政为官者既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时时自省、处处自律,做到不患得而患失,更要时刻牢记人才是权力的赋予者和归属者,任何时候都不可脱离人民群众。

明失是为了明得。从政为官者只有常存患失之心,明白什么可失、什么不可失,才能懂得什么可得、什么不可得,真正从思想上消除腐败的动因;明失更是为了不失,从政为官者只有不失原则,不失底线,不失勤勉奉公之德,不失清正之心,才可使政府不失清廉,政治不失清明,使党不失执政的根基。

却是看不见的,易被忽略的,有时甚至是失者难以自知的。

因而腐败的实质在于失。形式上未曾有所取、有所得的人,若失了克己之心,失了奉公之责,亦是有所失的。而这种失日积月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程度后,即便不取、不得,也必然会形成另一种腐败,本质上无异于那些有所取、有所得的腐败。对从政为官者来说,失的后果可能是各种非正当利益的取得,却也可能造成一种更大的失,那便是失了民心、失了执政的根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因此,防贪不仅要做到形式上的不取、不得,更要做到实质上的不取。前者靠的是严明的法纪与权力的公开等外部制度的制约,后者则有赖于从政为官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从政为官者既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时时自省、处处自律,做到不患得而患失,更要时刻牢记人才是权力的赋予者和归属者,任何时候都不可脱离人民群众。

明失是为了明得。从政为官者只有常存患失之心,明白什么可失、什么不可失,才能懂得什么可得、什么不可得,真正从思想上消除腐败的动因;明失更是为了不失,从政为官者只有不失原则,不失底线,不失勤勉奉公之德,不失清正之心,才可使政府不失清廉,政治不失清明,使党不失执政的根基。